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三辑

中朝日三国西学史

比较研究

李虎/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本书系延边大学“十五”211 工程建设项目
——东北亚与图们江流域开发研究子课题

中朝日三国西学史 比较研究

李 虎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比较研究/李虎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8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三辑)

ISBN 7-80109-996-6

I. 中… II. 李… III. 西方国家—影响—文化—对比研究—中、朝、日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3245 号

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比较研究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楼 3 层(100035)

电 话:66562725 66562726(编辑部) 81551485(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ctp.com.cn>

E-mai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278 千字

印 张:10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240.00 元(本册 28.60 元)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喷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

“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4.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前 言

西学是相对于东方文化即中朝日三国等传统固有文化而言的,是指来自于西欧的近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相对于封闭半封闭的东方国家,西欧率先进行了“社会转型”,完成了近代化的结构性转变。这一历史的变革时期开端于14世纪后的欧洲文艺复兴,直至18世纪后期由工业革命掀起的现代化的浪潮。在近500年的“社会转型”期当中,西欧完成了由一个从农业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近代工业化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

由14世纪开端的西欧社会近代化过程中,显现的近代文明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思潮,由欧洲向世界各地扩散和传播,并伴随“西学东渐”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过渡的剧烈变动。这种多变的现实社会的大变动,往往表现为精神文化的剧烈震荡与物质文明的进步。概言之,这一历史时期的中朝日三国西学发展史成为东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显例之一。

《中朝日三国西学史比较研究》的选题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时代呼应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西学论著的翻译出版,适时地满足了国内学界及国人了解西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但从比较学视角来看,自主研究西学,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则很少,且以往否定论占主导的情况下,西学研究没能得到充分的重视。

2. 对文化学的兴趣与关注。我曾阅读过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其中有段“针的启示”激起了我对文化学,特别是对文化传播学的浓厚兴趣。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些社会现象就不难发现,即使具有相同文化观背景的国家和民族,当面临相类似的问题时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或截然相反的反应。以往我们在研究和对待社会发展以及历史现象时,习惯于仅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事件或探讨其原因,这就会带来一系

列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或困惑。

3. 此课题有待进一步开发与研究。目前,中朝日三国西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一般局限于国别史研究领域,横向的比较研究成果相对缺乏。根据对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作综合考察与分析,国内外研究范围、进度以及成果不一,且国外研究历史久远,研究领域涉及广泛,研究成果种类繁多;而国内研究则刚刚起步,尚未形成学术氛围,且有影响的论著极少,特别是有关比较研究方面的著作更是寥寥无几,这种现状更是激起我的浓厚兴趣和挑战欲望。

如上所述,为探究中朝日三国在两次西学对应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融合体及其对三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影响,特别是为弥补当代学术界在西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重“个案”轻宏观研究的缺憾,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的、综合的文化比较学方法,对“西学东渐”及其中朝日三国西学的形成过程,从五个方面作了宏观性的考察和过程比较。

通过比较研究认为中朝日三国西学的形成与发展在形式上有其共性,都经历了西学初传、受挫、再传(西势)与确立的过程;与此相应,东西文化交流与冲突也经历了接触、排斥和接纳的融合过程,并形成了东亚三国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东西文化融合体。与此同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三国西学形成与发展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构成。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主要考察16世纪前后的东西方社会历史背景,探讨了“西学东渐”的初期传入特征及其三国西学的形成特点。第一节是“西学东渐”的历史前提,阐述文艺复兴后的西欧近代社会转型以及东亚三国的社会历史背景。“文艺复兴”后的西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滋生,各主要国家相继完成了近代的社会转型,特别是伴随新航路的开辟,以及由原先“农本”的传统转向实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借此促进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并掀起了“人类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开始走向世界历史”的序幕。而此时处于亚欧大陆东部的起先不比西欧落后的中朝日三国却故步自封,裹足不前,至此,东方人开始了要真正

面对“西方问题”时代的到来。第二节通过阐明西学初期传入东亚三国的具体过程,考察了东西方文明早期接触的历史轨迹。最初来到东方并揭开东西文化交流与冲突序幕的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第一个来到东方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他于1549年到达日本并在此传教。后由耶稣会士利玛窦,又于1583年到达中国内地传教,由此揭开了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序幕。而此时的朝鲜因地理等客观条件及其因素的限制,西学的早期传入具有了自身特点,即不像中日两国,西学的早期传入不是由外国传教士,而是“赴京使臣”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第三节从西学初期传入的主客体方面,即西学传播者和接受者两个方面,具体阐释了初期三国西学的形成。第四节围绕初期西学传入三国的不同特征,对三国西学的早期形成特点进行了比较,并得出西学在中日两国的传入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以传教与传技结合为特色,但相对而言,初期传入日本的西学不仅具有“商教结合”的特色,而且更显宗教性的特点。而西学传入朝鲜,不仅在传播的途径与媒介上有别于中日两国,具有自主性的传入特征,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其自身特点。即西学初期传入朝鲜,并不存在所谓的“传教”问题,因此,初期传入朝鲜的西学,在内容上更显学术性的特点。从接受主体角度,中朝两国的西学主体乃局限在部分“边骂边学”的儒学士大夫;而在日本,接受主体则是战国大名及其下层民众。

第二章为“西学受挫”。这一章主要考察东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历史轨迹。分四节,即中国西学萎缩;朝鲜“斥邪”风潮;日本颁禁“锁国”以及前近代东亚三国的西学成果及其比较。第一节主要考察中国西学萎缩的历史文化根源,即“中国礼仪之争”的由来和“西学中源”说的历史渊源。“中国礼仪之争”原本是耶稣会内部的分歧,后因罗马教廷的干预而发展成东西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就这一事件本身而言,它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异质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它所带来的后果是“致命”的,即由此引发了17世纪后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性灾难”。第二节阐述受“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朝鲜掀起“辟卫热”及“斥邪”风潮。朝鲜的“斥邪”风潮与此前发生的“中国礼仪之争”不无关系。

首先,朝鲜是传统的儒教国家,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历史渊源关系。其次,成立不久的朝鲜教会受北京天主教的影响,行“废祀焚主”。这给新生的朝鲜教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成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天主教惨遭官府迫害的重要诱因。由此可见,此后李龙舒等太学士上疏“斥邪”,并“掀导起辟卫热”乃与中国礼仪之争及其影响是有着直接关系的。第三节考察了日本颁布“驱逐传教士令”及其“锁国”缘由。16世纪时的日本由主动接纳“南蛮学”转而颁布“驱逐传教士令”,恰恰说明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势必反映在封建统治秩序上,其根源在于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的文化的的原因所致。第四节主要考察西学本地化过程和东亚三国的西学成果。通过西学本地化过程重点阐释了“锁国”体制下的日本兰学兴盛,并对导致三国西学成果及其水平差异的原因通过“文化东亚”概念进行了重点比较。“文化东亚”概念,其实是为阐述东亚各国作为整体在对应西学过程中的差异性而提出,即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显现的东亚各国文化的传统特性。通过比较认为,东亚三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是导致三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形成西学成果及水准差异的主要原因。如前近代的日本与中朝两国不同,由初期“锁国”开始调整主体文化取向,自18世纪初的“洋书解禁”步入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兰学历程。

第三章主要考察“西势东渐”及近代三国的西学回应。第一节主要对近代“西势”冲击下的三国反应作了进一步的考察,特别是对三国在开国进程中的不同反应分“被动受制”、“无所适从”和“灵活变通”三个部分来做了具体的考察与分析。从东亚三国的“开国”进程来说,存在着被动与主动之区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处在19世纪中叶,完全由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中朝两国儒学士大夫们,一是缺乏前近代积累的西学成果,二是根本就没觉察到有和西方打交道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下的突如其来的变局,只能是急促应对或无所适从;相反,日本有着前近代的兰学积累与成果,又有“通海外之情势者,除从事西学者外,实惟幕府”的主导等,由此在政策运筹到实践操作上尽可能做到灵活变通与主动应对。第二节进一步阐述了三国的近代西学对应,即在被

动、被迫受制于外来势力下的近代中朝日三国西学的展开,并在第三节中进行了重点比较。如上所述,在被动、被迫受制于外来势力下的中国西学,只能表现为“制夷论”下的西学对应;而在朝鲜则表现为“北学”论的进一步展开;日本则出现了幕末洋学的骤兴。幕末日本西学者确实表现出了少有的理智与开明,他们早在“西势”尚未到来之际,就已开始以主动、平和、从容的姿态来学习西方,吸取西学,为日本近代积累有用的精神文化并走在了中朝两国的前面。通过对三国近代西学对应的考察与比较,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前近代东亚三国的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历史的文化传统,对三国的近代西学对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日本,在严峻的危机时刻,朝野上下的危机意识空前高涨。他们不仅吸取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沉痛教训,同时又对美国“黑船”叩关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并开始筹划其摆脱民族危机的良策。这说明日本相对于中朝两国来说,对鸦片战争后的东亚形势,以及东方民族即将要面对的严酷现实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在近代西学对应上能够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并拿出主动的变通对策。

第四章,分三节对近代“西教”再传,以及基督教对东亚三国近代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具体考察与分析。在前两节中,通过考察基督教再传分析了其传入特征。通过考察与分析不难看出,进入18世纪以后,伴随着“中国礼仪之争”的进一步激化,西学传入,特别是天主教的传播受到了非难和前所未有的排拒。但到了19世纪中叶后,西方宗教在“西势东渐”以及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再度兴起。基督教的再度兴起标志着以“西势”为特征,以武力为后盾的西学揭开了东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新时代序幕。基督教传入中朝日三国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特征:一是,基督教传入日本,较之中朝两国更为艰难。这一方面是因明治政府仍固守“禁教”传统;同时又因主动性开国所带来的“交涉性条约”,使基督教传入相对缺乏强制性的后盾力。二是,比较中朝两国,日本在开国进程中侧重于“西器”的摄取,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基督教传入的先导作用。与此相反,在中朝两国却因这一进程的特殊性原因,使得基督教的传入不仅具有了侵略先

锋的特点,而且又具有了更强的“西势”保护。三是,近代中朝日三国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基督教的传入与传播。但比较而言,基督教在近代中朝两国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更为深刻。第三节通过对宗教及其性质的分析与考察,论述了西方宗教在东亚三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通过考察与分析不难看出,西方宗教在“西学东渐”中曾起过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明末清初东来传教士对当时的科学发展和东西文化交融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它谱写了包括中朝日三国在内的东方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新篇章。特别是近代基督教的传入与传教士的活动,为东亚社会带来了“启迪新知”的近代科学与新式的教育体制,以及民俗新风等近代化的因素。除此之外,基督教的传播与传教士的努力,还体现在了“东学西渐”上,如“西学东渐”过程中,传教士不仅翻译著述了大量的西学书籍,而且还将东方文明介绍到了西方,充当了“东学西渐”的重要角色。

第五章重点考察和分析了近代中朝日三国西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第一节是近代中国西学发展。这一节对 19 世纪末的新学与新文化思潮做具体论述的前提下,阐释了近代中国西学形成和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围绕严复西学观的分析,重点阐明了 19 世纪末“新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及其现实意义,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第二节通过对朝鲜近代开化思想的考察,进一步阐述了近代朝鲜西学的形成过程。近代朝鲜西学以“变法开化”为特征,自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朝鲜激进的开化论者,通过来往于日本并借助“明治维新”的启示,通过采取“宫廷政变”式的政治运动,来实现爱国图新的目标,并由此揭开近代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序幕。第三节重点考察了日本明治时代的西学。明治时代的日本,通过两个纲领性的文件积极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在“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下,开始了大规模地学习、引进西方科技、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社会改造运动,并使近代日本西学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第四节对近代三国西学形成特点和三国西学命运作了综合的考察和比较。由此得出,近代中朝日三国在对应西学的过程中,变异出的一系列学术文化

融合体是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然产物。与此同时,由于三国相近的社会基础及时代背景,又决定了近代东亚三国在文化选择的途径上,不得不或只能采取“体用”模式和“改良”式的社会运动,如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朝鲜的甲申政变及甲午更张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等。从文化层面而论,“改良”乃是近代中朝日三国对待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它主要体现在“中体西用”、“东道西器”或“和魂洋才”上。但作为主流文化融合体的“中体西用”、“东道西器”则未能使中国与朝鲜成功地实现近代化,而同工异曲的“和魂洋才”则使日本走上了近代化的成功之路。究其原因,固然有其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三国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西学成果及水平差异是其主要的因素之一。换言之,导致三国西学命运“不同结局”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外部条件,而在于三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孕育和营造的内在因素,即历史文化的传统差异是最主要的、也是其深层的原因。

综观中朝日三国西学史,不妨认为日本与中朝两国不同,它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学取向及其推动近代社会转型的内在发展机制,而自前近代开始的中朝两国对西学缺乏理性的判断,恰恰说明了它是两国历史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本文从文化比较学视角,把中朝日三国西学作为整体来考察,进行宏观的过程比较,以及对三国近代社会转型及其导致“不同结局”的原因作深入的探究,由此形成了本论文研究的主要特色。

作者

2004年5月

目 录

绪论	(1)
一、西学定义及其发展史概况	(1)
1. 西学定义及其分类	(1)
2. 中朝日三国西学发展史概述	(7)
二、研究动态及其意义	(15)
1. 选题意义	(15)
2. 研究动态	(17)
3. 存在的问题	(20)
三、研究方法与结构	(21)
1. 西学史研究方法	(22)
2.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23)
第一章 西学初传	(25)
第一节 历史前提	(25)
一、“文艺复兴”后的西欧社会	(25)
二、16 世纪前后的东亚三国	(28)
第二节 东西文明的早期接触	(30)
一、天主教的早期传入	(31)
二、朝鲜引入西学	(37)
三、日本“南蛮学”的传入	(42)
第三节 初期三国西学的形成	(46)
一、适应主义策略	(47)
二、向西方学习	(52)
第四节 初期三国西学特征比较	(62)
一、初期三国西学的传入特征	(63)
二、初期传入三国的西学特色	(67)

三、初期三国西学的形成原因分析	(70)
第二章 西学受挫	(74)
第一节 中国西学萎缩	(74)
一、中国礼仪之争	(74)
二、“西学中源”说	(77)
三、“禁教”风潮	(79)
第二节 朝鲜“斥邪”风潮	(82)
一、朝鲜的“辟卫”热	(82)
二、“教难”与“邪狱”	(90)
第三节 日本颁禁“锁国”	(94)
一、“驱逐传教士令”的颁布	(94)
二、日本“锁国”缘由	(98)
第四节 前近代三国西学成果及其比较	(101)
一、西学本地化及其成果	(101)
二、西学成果及水平差异的原因	(112)
第三章 西学再传	(120)
第一节 “开国”之异同	(120)
一、中国:被动受制	(120)
二、朝鲜:无所适从	(124)
三、日本:灵活变通	(126)
第二节 近代三国西学对应	(133)
一、“制夷论”的展开	(134)
二、“北学”与近代朝鲜西学	(140)
三、近代日本洋学骤兴	(147)
第三节 近代三国西学对应比较	(151)
一、西学对应的社会历史条件	(151)
二、西学对应的形式与内容	(160)
第四章 近代西教	(169)
第一节 基督教再传	(169)

一、基督教与中朝两国	(169)
二、基督教在近代日本	(181)
第二节 传教士与近代教育	(184)
一、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	(184)
二、传教士与朝鲜近代教育	(187)
三、传教士与日本近代教育	(191)
第三节 宗教性质及其作用	(193)
一、宗教内涵及其性质	(193)
二、基督教东传及其历史作用	(194)
第五章 西学确立	(201)
第一节 近代中国西学发展	(201)
一、新学与戊戌维新	(201)
二、新文化思潮的萌动	(206)
第二节 近代朝鲜西学的展开	(210)
一、维新思潮在近代朝鲜的传播	(210)
二、近代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	(213)
第三节 明治时代的日本西学	(220)
一、明治维新	(220)
二、文明开化	(223)
第四节 近代三国西学形成特点比较	(226)
一、近代三国西学实质	(226)
二、近代三国西学特点比较	(245)
三、三国西学的历史命运	(253)
结论	(261)
附录 中朝日三国西学史对照年表	(268)
参考文献	(294)
后记	(301)